

抗战爆发后,油轮受阻,大后方闹油荒,影响作战及生产,国民政府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加紧开发油矿。

开发玉门油矿

1938年,民国政府经济部决定开发甘肃玉门油矿,但当时仅有的两台先进钻机此前已被安置在延长县,当时延长县已被红军占领。汉口撤退前,经济部长翁文灏与周恩来协商索要钻机,周恩来从抗战大局出发,表示赞同,并派钱之光具体办理。

1939年春,在玉门油矿老君庙打出第一口油井,日产原油10吨。1941年成立甘肃油矿局,驻重庆办公。委任能源专家孙越崎(见图)为总经理,严爽为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炼油厂厂长。

玉门油矿所需水泵、油泵、炼油釜、阀门、管件等设备配件,全部从重庆订购,连同由沦陷区拆迁来的和由重庆江北自来水厂拆卸的钢板、管子、马达等,经长途车运到矿区。油矿职工苦干数月,自行设计制造了24座釜式炼油炉。打井用的水泥只有重庆一家生产,打井用的重晶石来自于涪陵地区。甘肃油矿局自设运输处于歌乐山,自重庆至玉门沿途设了十多个车站,

孙越崎的实业救国之路

·杨耀健·



将各种器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玉门。

孙越崎每年夏秋常驻玉门督促生产,冬春在重庆筹划财务预算及器材的搜购转运,并兼顾四川各煤矿的产销工作。

创业艰难

玉门油矿位于戈壁滩,土壤含沙量太多,不能烧砖瓦,唯有采用“干打垒”的方法,将屋顶筑成拱形,上盖沙土拌油渣,以避雨雪。后来从外地拉土到矿区烧砖瓦,方可建造楼房。半年的冰雪期,取暖做饭,仰仗祁连山里的小煤窑。炼油剩下的重油和油渣,没有裂化设备再提炼,也被利用来做燃料。粮食来自数百里外的张掖、武威、山丹等地产的麦子,到手后还须经过面粉厂加工后才能入

口。工人穿的老羊皮袄,容易生虱子,又痒又疼。矿上建起蒸汽浴室,把老羊皮袄挂在屋内,以高温杀灭虱子。

1942年,矿区员工达到6800余人,连同家属多达数万人,吃喝拉撒很伤脑筋。矿上只得自办供销社、百货公司和副食品商场,从重庆等城市拉来布匹、衣服、鞋帽、文具和干鲜水果等。又在玉门县办蔬菜农场,并自制酱油和醋。

开发资源人才是关键,能否留住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工学院招聘的几百名大学生,婚姻是个重要因素。孙越崎与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相识,后者在重庆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他就委托邵夫人在该校挑选一批肯吃苦耐劳、有志边疆建设的女学生送到矿上,安排担任教员、护士、财会和其他管理及文娱工作。这样一来,矿区气氛活跃,大学生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国石油工业战线的许多专家,大多是从玉门油矿起步的,大名鼎鼎的“铁人”王进喜也出自于玉门。

万里运油

玉门油矿的产品,除部分供应西北公路局等单位外,主要销往重庆和大后方。1940年,炼油能力提高到1500吨,储运能力却远不能适应。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贫弱的中国连贮油罐也无法制造,战前进口的两个贮油罐,转眼间就已装满,车队一时不来拉油,炼油厂就要停工。一方面,前方的战军舰船缺油告急;另一方面,玉门油矿有油运不出来。

孙越崎心如火焚,他借蒋介石到玉门油矿视察之机,请求拨给油矿6万个200公升的空油桶贮油,蒋介石即令后勤司令部拨运了3万个。这些空油桶虽十分破旧,但经检修后大部分能用,炼油厂可以日夜三班连续生产了。油矿又新规定来提油的单位自带空油桶,矿上以装满油的油桶交换,用户称便,一举两得。

但那时没有铁路,从玉门到重庆往返5000公里,全靠几百辆汽车运油,路况车况均不佳,运油车本身消耗油料极大。为节约,油矿局将黄河上使用的羊皮筏子搬到嘉陵江上

立功受奖

1943年,针对国民党政府中某些人不相信能长期开采石油,提议停止对玉门油矿拨款时,孙越崎提出年产180万加仑汽油的要求。他逐一审查计划,落实措施,发动员工。到当年岁尾,奋斗目标终成现实,炼油厂、电厂的汽笛齐鸣,人们将他抬着在矿区内欢呼游行,一直抬到露天剧场的戏台上。

国产汽油大力支援了抗战。1943年日军强渡武陵渡,企图入侵陕西省。玉门油矿就近供应油料,使中国军队增加运力,及时将苏联援华的火炮拉到前线,阻遏了敌人的进攻。1944年,美军远程轰炸机“空中堡垒”以成都太平寺机场为基地,多次轰炸日军占领区和东京,其地勤用油使用的也是玉门油矿产品。因开发玉门油矿的卓著勋劳,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孙越崎被授予金质奖章。(摘自4月28日《人民政协报》)

1911年9月2日,林弥一郎生于日本大阪郊外的农民家庭。1932年他应征入伍,由一名普通航空兵成长为战斗飞行员。1938年底成为日本陆军少尉飞行员。他参军并成长的这一阶段,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扩张野心膨胀进而发动侵略的时期。

被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感动

1944年11月,林弥一郎被派往中国东北,担任驻沈阳的飞行队队长,驻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负责飞行员的培训及防空任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9日驻守沈阳的林弥一郎带领飞行大队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辽宁南部山区逃跑,9月29日逃到凤凰城附近的山区。

此时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凤凰城附近追击敌人,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林中发现了逃窜的林弥一郎飞行大队,迅速将他们包围,并向上级领导曾克林报告了这一情况。

曾克林立刻向上级作了汇报,准备劝降林弥一郎,和平收编该飞行大队。八路军迅速组成了谈判小组,与林弥一郎等人进行了谈判。谈判小组讲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性质,明确了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欢迎对方和平投降,并承诺言出

中国航校的日本教官

和平使者林弥一郎

·门晓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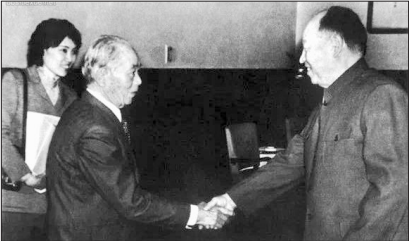
必行。

林弥一郎等人一开始对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半信半疑,但弹尽粮绝、无处可逃的他们也只能接受投降。随后,八路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多年以后林弥一郎在他的《我与中国》一书中,十分感慨地写到,简单、庄严的受降仪式让他终身难忘,八路军还千方百计找到大米送给他们,中国自己的官兵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饭,都是天大的奢侈,能这样对待300多名日本俘虏体现出了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人道、真诚。

曾克林又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宴请了林弥一郎等几位俘虏代表,席间重申了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并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了,希望他们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让他们回到机场看管维护好飞机,等待上级领导的指示与安排。

伍修权赠枪

曾克林把林弥一郎等人投降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和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彭真和伍修权决定见一见这些日军飞行员俘虏。随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俘虏代表被送到沈阳,彭真和



▲彭真会见林弥一郎
◀空军第七航空学校第一任校长魏坚和林弥一郎(右)

伍修权亲自接见了他们,再次向他们讲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结束了,希望他们为我党筹备航空学校提供帮助,并承诺等时机成熟,就送他们回国。

在谈话的过程中,林弥一郎目不转睛地盯着伍修权腰间一把精致的小手枪,最后向伍修权提出把这支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后来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说过,这把手枪陪伴他走过万里长征,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是他心爱之物。为了表明共产党人的坦荡与真诚,伍修权毫不犹豫地把手枪交到林弥一郎手上。林弥一郎后来回忆说:我望着他充满信任的眼睛,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当场表示愿意帮助中方创办航校。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就成立了航空小组,负责人之

一常乾坤作为最早一批航空小组成员到达东北。1945年10月,中共东北局决定组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林弥一郎飞行大队的全体人员、飞机、器械等全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主任教官,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这位主任教官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方面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员。在别人对他的严格不理解时,他都会严肃地说:我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就是对学员、对中国不负责任。

从这所学校里走出160多名飞行员,有23名飞行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当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沸腾,中外见证了中国空军的一夜诞生。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美

军王牌飞行员的张积慧、林虎、王海、刘玉堤等战斗英雄,都是林弥一郎这位教官的学生。

中国没有忘记他

1956年8月,林弥一郎回到了日本,中国共产党人兑现了承诺。此时的国际格局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麦卡锡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从社会主义中国回到日本的日籍八路军、解放军老战士生活环境严峻。老战士们成立了多个民间组织,用亲身经历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呼吁人们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呼吁世界和平。

林弥一郎曾担任过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他说过,从对待日本战俘的处理、对日本不索要战争赔偿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始终贯穿着和平友好的方针,他要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推动中日友好作贡献。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1977年5月,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邀请林弥一郎夫妇访问中国,1985年1月彭真、伍修权在北京会见了林弥一郎,1986年东北老航校纪念建校40周年,空军司令员王海会见了当年的老师林弥一郎,1996年老航校建校50周年,再次邀请林弥一郎访问了中国。

1999年8月,林弥一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还对身边的人说:帮助中国共产党办航校没有后悔,身为教官是他的骄傲。(摘自4月29日《学习时报》)